

論壇版是一個公開的評論園地，歡迎社會各界人士與專家學者來稿。本版文章不代表本報立場。為增公信力，文章署真實姓名及身份。刊出敬奉薄酬。

來稿可用下列方法：郵寄：香港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文匯報論壇版》 傳真：28731007 電郵：opinion@wenweipo.com

2017年政改歸根究柢是什麼問題？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楊志強

志強時評

香港政壇最近有人提出「守尾門」方案，即容許反對派甚至對抗中央的人入閘參選，由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把關。有人又傳播虛假消息說，「中央消息人士承認，2017政改問題，歸根究柢就是是否容許『泛民』入閘的問題。」但是，2017政改歸根究柢是什麼問題？歸根究柢是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這是一個關係「一國兩制」成敗的重大問題。對此，有人偷換為「2017政改問題歸根究柢就是是否容許『泛民』入閘的問題」，並且造謠說是「中央消息人士承認，這是企圖突破中央對普選行政長官的底線即「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因此，對「守尾門」方案，有必要辨析和澄清。

所謂「守尾門」方案，即容許任何反對派甚至對抗中央的人入閘參選，經全港市民普選出特首人選，由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把關，倘認為人選不合適，可運用憲政權力否決人選。又有人聲稱拒絕反對派中人參選特首普選行不通，若市民2017年選出反對派人士為特首，相信中央會接受，否則可能會引起「暴動」。

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是底線

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是設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在特首普選的憲制框架中，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閘門有兩道，一是提名委員會提名程式，一是選舉過後的任命程式。兩者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在任命行政長官的問題上，《基本法》第45條第1款明文規定了中央政府的「任命權」，「不任命權」和其他方式的罷免權都是伴隨任命權而來的權力，也可以說是中央固有的主權權力。有人提出，如果中央的委

任權（「任命權」）可以在政改諮詢，以及在政改方案通過時得到各政黨政團，尤其是「泛民」的公開表態，衷心支持，那就算在拒絕委任時，也只會出現參議院駁回眾議院議案的平常情況，最後關頭有險可守，第一線不駐重兵，還是可以商量。但是，中央的「實質任命權」是中央固有的主權權力，難道要「泛民」的「公開表態，衷心支持」才能確立？所謂「第一線不駐重兵」，意即在球場上，要求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全部撤下球場，放棄前門和中門，讓反對派和背後的外國勢力全力進攻，使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行政長官人選，只讓中央「守尾門」決定是否任命。

為何在政治上應避免中央行使是否任命權

當然，雖然在法律上中央政府可以行使是否任命權，但在政治上，卻應當避免行使有關權力。為何在政治上應當避免中央政府行使是否任命的權力？首

先，「守尾門」方案突破中央底線，有可能讓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行政長官人選，若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否決此人選，將引起香港社會巨大的政治波動；第二，若中央運用「實質任命權」否決此人選，如果要重選，一旦對抗中央的候選人再度獲勝，屆時就陷入憲政危機；第三，否決「當選人」之後的一屆立法會選舉於鐘擺效應下，市民投票的意向將會全面傾向反對派，特區管治將受到巨大衝擊。

因此，為了中央政府避免行使有關權力，在政改「五步曲」和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環節、普選環節和任命環節，特區政府、立法會、全港選民和中央政府都有責任守住這一底線，特別是提名委員會在提名環節必須把好人選。

豈可偷換原則性重大問題

有人用「2017政改問題歸根究柢就是是否容許『泛民』入閘的問題」，偷換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這個關係「一國兩制」成敗的重大問題，是極不負責任的做法，對國家利益和港人福祉，都會造成巨大損害。對此，今年3月24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與香港立法會議員座談時強調：「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是設計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的一條底線。守住這條底線，不只是為了國家安全和利益，從根本上講，也是為了維護香港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投資者的根本利益。」

提委會委員和香港市民心中有桿秤

喬曉陽指出，「试想，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與這種大勢背道而馳，大家可以預見，屆時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聯繫必然嚴重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撕裂，『東方之珠』還會風采依然嗎？」眾所周知，「台獨」分子陳水扁當台灣地區領導人期間，島內族群撕裂、人心惶惶，陰象環生，社會混亂、股市下滑、經濟沉淪。如果選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當行政長官，香港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互惠互利的優勢將喪失殆盡，香港經濟將迅速邊緣化，投資者將紛紛撤離，港股將一沉不起，樓價將急遽下跌，公司倒閉潮將成骨牌效應，屆時將一職難求，數以百萬計人失業，港人將何以為生？

2017年政改歸根究柢是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這是一個關係「一國兩制」成敗的重大問題。「守尾門」方案企圖在提名委員會的提名階段讓反對派人士甚至對抗中央的人士成功提名，並且誤導市民投票給成功提名的反對派人士甚至對抗中央的人士，這嚴重抵觸中央底線。喬曉陽代表中央強調：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是一條底線，這樣講不是為了從法律規定上排除誰，篩選誰，而是為了讓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委員和香港市民心中有桿秤，有個衡量的標準，自覺不提名這樣的人，不選這樣的人。

戴耀廷為何屈中央？

蕭平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今日發表署名文章，現載譯如下：

身為學者，戴耀廷卻在玩弄學術，為了圓他「和平佔中」的悖論，又拋出「彈票」說，既騙港人，更屈中央。

按照戴的邏輯，基本法承諾香港普選的時間點是2007，2007不成就該在2012，只因中央不肯兌現承諾，兩次「彈票」，才一再拖延下來。

不錯，基本法明確香港「最終達至普選」，但並未給定普選的時間點。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了第一、第二任行政長官和第一、第二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對2007年及以後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如何產生則未作具體規定，只規定了「如需」對既定的產生辦法做出修改必須經過的法定程序。也就是說，2007年前應該對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作出判斷，這就是當時所說的「政制檢討」。可檢討就是檢討，檢討的結果是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憑什麼認定就要普選？

香港民主發展的依據是基本法，基本法要求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所謂實際情況，最緊要的就是全社會對政改的承受能力。在沒有廣泛共識的情況下操之過急，必將給經濟、政治造成巨大衝擊。事實上，香港社會對普選快慢始終存在明顯對立。2004年2月20日胡應湘在《明報》撰文，稱《普選令香港喪十年》，頗能代表工商界對匆忙普選的擔憂。鄧小平早就說過，「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中央充分考慮香港民意，准許對2007、2008兩個產生辦法作出修改，為未來普選鋪路。若不是「民主派」捆綁否決，排斥起碼的漸進，2012或許是另一番光景，憑什麼怪罪中央？

戴耀廷說，因為中央「彈票」，所以他要先小人後君子，以「佔中」來要挾。可嘆的是，罔顧事實豈是君子所為？小人手段又豈能嚇倒中央！

楊澍棟走了，夏千福來了。有人出於良好的願望，說夏千福會注意自己的形象，加強和中國合作。

經常報道夏千福活動和言論動向的美領事館facebook，近日做了一個民意調查，詢問港人「你的夢想是什麼呢？」接着，刊登了調查結果，有百分之九十的香港人表示最希望「香港獨立」。

誰都知道，電腦上的民意調查，可以用軟件進行回應，虛構出許多點擊率，或者發出許多電郵，偽造民意，所以，可信程度很低。是否發表這個調查結果，怎樣看待這個虛擬世界的調查結果？美國總領事館應該有很大的酌情權。如果美國這位新總領事，相當重視他的形象，和中國的關係，就會很慎重地處理「港獨」的敏感問題。現在他決定把這個新聞放在網上，意味着什麼？究竟是草率，還是有另外的含意？

美國正在紀念人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發表著名演說「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五十周年，美國現在的夢想，就是推行「重返亞洲政策」，夏千福當然會全力以赴。美國重返亞洲政策，說到底，就是根據美國現在的國力，怎樣利用亞洲的矛盾，利用美國的外交影響，挑撥離間，利用亞洲人牽制亞洲人，遏制中國的經濟崛起。

在香港怎樣利用反華勢力的力量，是美國的一個重要部署。但是，作為一個外交人員，受到維也納條約的約束，夏千福應該吸納其前任楊澍棟的教訓，處理好在香港問題上的中美關係，避免瓜田李下，引起干涉內政的爭論。

夏千福抵達香港的時間是微妙的。美國當然關注香港的政治發展，夏千福上任的時候，發表書面聲明：「很榮幸能夠親歷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走向「真正的普選」，「真普選」這個政治術語，正是反對派所提出。如此敏感的說話出自夏千福之口，當然經過一番考量，不會「急就章」隨便表態。聲明無提及「佔中」問題，但立場明顯較楊澍棟更高調。夏千福在外交部的行政架構中，不需要向美國駐北京的大使匯報工作，而是直接向美國國務卿負責，這樣突出的角色，說明了美國對香港政治變動重視的程度。

夏千福任內最大的政治任務就是香港的政改角力，他的政治前途全繫於此。從抵港履新至今不足一個月，夏千福便迫不及待要與香港政黨會面，而且主要議題是談論政制發展，理由是「美國在香港有六萬僑民和商業貿易的利益」。如此說來，在香港有商業的利益，美國就要討論和影響未來的行政長官的產生嗎？

夏千福設計了他的政治形象，選擇了幫襯地道食肆，拜寺廟，吃蛋撻，目的是要爭取港人認同。不過，他盡量要模仿吃蛋撻的彭定康形象，也有一種暗示的味道，彭定康的主要事業是政改，難道夏千福要做半個彭定康？

如果說，美國在香港有重要商業利益，那麼，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保持香港是中美貿易和投資的一個橋樑，不要鼓勵任何衝擊香港繁榮穩定的冒險行為，特別是「佔領中環」的行為，正是美國利益之所在。一個成功的外交家，應該在外交的崗位上，推動美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合作，互相信任，而不是相反。夏千福未來幾個月，還會採取什麼動作，值得細心觀察。

學民思潮向反對派政黨「逼宮」說明什麼？

卓偉

學民思潮高調向反對派政黨「逼宮」，說明幕後勢力對「真普聯」內山頭林立，在政改方案上遲遲未達共識早已感到不滿，決定利用學民思潮這個組織，加上胡蘿蔔與棒子，務求盡快將反對派的政改立場統一到「公民聯署」之上，將整個反對派牢牢地網綁在一起，為下一輪政改戰役作準備。然而，吸取過去經驗，反對派每當網綁在一起，結局只有一個，就是被激進派騎劫，令政改再度破局。任何對香港負責任的政黨都應三思而後行，以免成為香港民主的罪人。

在「真普選聯盟」仍未就特首普選作出定案之時，學民思潮日前率先提出了所謂《全民提名聯署約章》，要求「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並向各反對派政黨「逼宮」加入聯署。至今，「人民力量」、社民連、街工、新民主同盟及保衛香港聯盟已先後簽署，原來對建議有保留的公民黨，近日亦在壓力之下改口支持，只剩下民主黨、民協和工黨並未簽署。學民思潮目前正不斷施壓，多番表示對這些政黨失望，更語帶威脅的指「未來如有更多市民支持約章的理念，其他『泛民』議員都要改變立場」。由一班學生組成的學民思潮，竟然可代表反對派就普選特首「開價」，多個大黨跟隨其指揮棒起舞，一班政黨大佬在記者會上甘作佈景板，《蘋果日報》也將他們捧上了天，沒有幕後勢力撐腰有可能嗎？學民思潮「逼宮」背後又說明了什麼？

企圖再次網綁反對派

這說明幕後勢力意圖重施網綁的故伎，推出學民思潮，將反對派各政黨推向激進的路線。這種伎倆已非第一次使出。第一次政改討論時，就是李柱銘、陳方安生、陳日君和黎智英等人結成反對派「四人幫」，威逼利誘地將各個黨派綁在一起否決了政改方案。

第二次「四人幫」則通過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五區公投」再施網綁故伎，結果被民主黨元老司徒華壞了他們好事。

現在到了第三次政改討論，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原因是方案關係2017年的普選特首，關係香港管治權之爭，對外國勢力來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並且早已作出全面部署。在今年初就開始策動「佔領中環」，要以「核爆」香港癱瘓特區政府管治作為威脅；繼而將所有反對派議員及各個政黨團體歸入「真普聯」之內，務求統一反對派口徑；在社會上大量資助「港獨」組織，不斷作出挑釁中聯辦、挑釁駐軍部隊的行動，挑戰中央對香港的主權；鼓吹所謂「本土意識」，煽動「港獨」歪風，這一連串動作都是在這半年之間猝然而至，如果沒有一個幕後勢力指揮，操盤佈陣，沒有源源不絕的資源投入，能夠做出這樣的聲勢嗎？

然而，在最終政改開價上，反對派至今仍未達成共識，「真普聯」提出的三個方案，旨在測試水溫，當中提到的公民聯署提名方案，更加引發社會包括反對派內的廣泛爭議。激進反對派認為在公民聯署必須企硬，但不少反對派政黨對此都有保留。原因很簡單，所謂「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實質就是廢除了提名委員會制度，令

提名委員會名存實亡，這個方案顯然與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相違，中央是不可能接受這樣一個違法方案。激進反對派企硬公民聯署，甚至以「佔領中環」迫使中央就範，最終不能得逞之餘，更會令本港的普選進程胎死腹中，這是不少反對派政黨對該方案有保留的原因。

公民聯署違反基本法與人大決定

激進反對派及其幕後勢力，絕對不想見到有反對派政黨擺脫網綁，破壞其奪權的部署。就在這個時候，學民思潮突然走了出來，由只講「國教議題」到大談政制發展，並且在短時間內就制訂出一份特首普選的方案，提出所謂「奪取政府」的口號，但方案內容只有一個，就是「提名委員會由全港選民組成」。但這個連傳媒都不熱衷報道的方案，竟迅即得到社民連、「人民力量」的全力支持，並四出向各反對派政黨游說以至施壓，威逼各黨派參與聯署，反對派喉舌也為方案大力吹捧，最終令多個小黨相繼投誠。而公民黨開始時稍稍遲疑，已經被一眾激進反對派人士罵得狗血淋頭，及後也乖乖歸隊。

這顯然是幕後勢力發功所致，反映幕後勢力對「真普聯」內山頭林立，在政改方案遲遲未達共識早已感到不滿，決定利用學民思潮，加上胡蘿蔔與棒子，務求盡快將反對派的政改立場統一起來，為下一輪政改戰役作出部署。因此，學民思潮突然有政治能量向各反對派「逼宮」，實際上反映了外國勢力已經急不及待，要將整個反對派牢牢地與激進派網綁在一起。然而，吸取過去經驗，反對派每當網綁在一起，結局只有一個，就是被激進派騎劫，令政改再度破局。任何對香港負責任的政黨都應三思而後行，以免成為香港民主的罪人。

香港須為美國退市作準備

曾淵滄 博士

政經多面體

上星期，香港金融圈子突然出現一陣恐慌，恒生指數在三天內急跌1,000點。許多人都在說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可能重演。

當然，如果我們細心地分析目前亞洲諸國的經濟金融情況，與1997年有些相似，但也不全一樣。相似點是美國經濟復甦，美元轉強，亞洲諸國則恰恰相反，經濟走下坡，貨幣匯價下跌。不過，不相同的地方是1997年時，亞洲諸國的貨幣多與美元掛鈎，經濟滑坡，貨幣幣值理應自動貶值。但當時亞洲諸國政府仍不自量力把自己的貨幣與美元掛鈎，結果引來了索羅斯這批國際大鱷的狙擊。一輪狙擊之後，索銖垮了，緊接着是印尼盾、韓國圓、新加坡元、馬來西亞令吉、日圓……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了。但是，目前亞洲諸國中，只有香港的港元仍然與美元掛鈎，餘者全都自由兌換。近一兩年亞洲諸國經濟差，貨幣幣值早已貶值。近一段日子，貶值幅度擴大，那是借助傳媒渲染

亞洲金融風暴重臨的結果。既然貨幣已是自由浮動，而且也已經相應的貶值，狙擊者的狙擊誘因也下降了。目前情況的第二個與1997年不同的事實是：1997年港股正創歷史新高位，目前則在低位徘徊。港股若處高位，狙擊者沽空有肉吃，港股低位徘徊，沽空者沽空沒肉吃，再往下壓，能壓低多少？

不過，我們倒是留意，引起上星期金融市場的一場恐慌的主因是美國聯邦儲備局的退市言論。美國推行量化寬鬆已經接近5年，長期的印鈔票、長期的超低利率也帶來了一些副作用。因此，美國聯邦儲備局遲早會退市的。近日的恐慌是因為金融圈子傳出9月份美國聯邦儲備局開會時就會退市，我們的確不知道美國幾時會退市，但是，退市始終是遲早會發生的事。香港特區政府是應該有一定的準備功夫。

我認為最重要的準備功夫是房地產政策。儘管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多次推出一些特別印花稅、買家印花稅、雙倍印花稅等，但是，正式

立法仍未進行。我認為，立法的內容應該盡量靈活。印花稅稅率不該由立法來決定，而是立法授權財政司司長決定。為什麼要把稅率的制定交給財政司司長？目的就是保持靈活性。國際金融市場多變，如果這些用來打壓樓市的稅制不夠靈活的話，萬一國際金融秩序大亂，香港股市、樓市再度面對國際大鱷狙擊時，就會產生很大的危機。所以，給予財政司司長應變的權力是很重要的。通過立法來改變稅率也許得經過好一段時間，情況一惡化就不易扭轉。



■曾淵滄